



抗战胜利后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历史观察（1945—1952年）

李文墨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on China's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Post Anti-Japanese War Victory (1945—1952)

LI Wenmo

Abstract: When discussing China's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emerges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in establishing various architecture programs in the country. Through examining the planning system, planning practices, higher education, and related field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education during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period and summarizes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emergence of planning programs in New China. 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provided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for establishing the planning discipline, allowing it to assume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reconstruction. Consequently, in 1952, Tongji University launched the first urban planning program in China, made possible by the enhanced accumulation of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of post-war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post anti-japanese war victory; post-war reconstruction; urban planning history;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提 要 就我国城市规划教育而言，抗战胜利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构建各建筑院校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在二战结束后进行战后重建中，通过对规划制度、规划实践及高等教育等与规划教育相关领域的历史观察，考察这个时期规划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研究规划教育领域的时代特征和新中国规划教育形成所具备的基本要素。战后重建为规划学科提供实践机会，让规划教育肩负历史使命。由此，抗战胜利后在全球战后重建的背景下，强化了城市规划教育资源的积累，并于1952年在同济大学诞生了国内首个城市规划专业。

关键词 抗战胜利后；战后重建；城市规划史；规划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306015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3)06-0113-06

抗战胜利后，千疮百孔的城市面临战后重建与复兴，原来西迁的教育资源需要复员与重建。规划教育的历史观察对规划学科史的研究日渐重要，其根源在于教育是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近些年，已有关于“规划教育史”深专的研究成果，其中系统回溯近百年的学科教育历程，近代城市规划教育史的整体研究^[1]，也有聚焦于规划名校同济百年规划教育的探索^[2]、早期规划教育^[3]、教育思想史^[4]，针对自编教材研究近代规划知识体系^[5]，聚焦于规划学者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影响研究和回忆录^[6-8]，还有新中国成立初期规划工作者的口述史研究^[9]，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规划教育本土化发展的研究^[10]。

规划教育史研究是学科史的重要部分，旨在寻求当下规划学科的历史基础，并回答“从何而来”学科思想源头问题。因专业人才培养与国家、社会的需求相关，所以战后重建时期建设规划人才的培养势必得到国家、社会的重视。关于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百年历程，就抗战胜利后重建阶段的研究成果而言，尚未对此提出研究与论断。本文试图在既有近代学科发展史研究的基础上，将抗战胜利后至院系调整时期作为历史切片或者一个关键环节，以国际规划理论发展的视野，观察这一时期我国规划教育之变。

1 一个关于规划学科发展的特殊时期

1.1 战后重建成为世界规划发展的重要时期

“抗战胜利后”一般指194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世界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对我国而言，“抗战胜利后”包括中国近代史最后的5年（1945—1949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在史学研究中“1945—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关键性的转折年代，是决定现代中国政治命运的时期^[11]。在世界范围内，战后重建时期是城

作者简介

李文墨，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副教授，heimu990@126.com

市规划学科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回首20世纪中国城市规划的学科发展历程,该时期可谓“承转”“启合”的历史时期。彼时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重建、新建,留学欧美的技术人才归国,完善都市计划制度,编制重点城市的规划项目。

多所高校延续或新设都市计划^①相关的课程,客观上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与1952年院系调整、规划专业的诞生提供条件。因此,抗战胜利后中国规划学科的发展是我国近代规划学科的历史总结,是我国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建立的基础,是战后重建期世界规划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2 20世纪我国规划教育历史交替的重要时期

我国城市规划教育在抗战胜利后(1945—1952年)的发展阶段,属于近代规划教育的发展形成期(1937—1952年)^②的范畴,而规划学科整体构建分期与之存在着明显区别,1937—1949年被定为“规划制度的建立与规划实践展开”的学科进步阶段^[1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构建。由于规划教育不仅受制于规划实践、规划理论的发展,还受包括国家教育政策在内的社会背景影响,因此,规划教育的抗战胜利后阶段,将这种历史分野与阻隔黏合起来,使民国时期规划学科的既有积淀延至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之际。1949—1952年也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段,体现出“除陈布新”的重要作用^[1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规划学科整体处于一个学苏的状态,而高校的规划教育又具有本土化发展的特征^[10]。从20世纪我国规划教育发展看,抗战胜利后是一个历史交替的重要时期。

2 战后世界城市规划的整体发展

二战后以“重建”为主题的规划实践,促进全球范围内规划理论与规划教育的快速发展。从全球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视阈看,抗战胜利后我国的规划教育,连同规划实践,是战后全球规划学科发展的组成部分。

2.1 “重建”是战后城市规划的主题

战后重建为世界城市规划学科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尼格尔·泰勒^[14]所著《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以1945年作为研究的起始点,对二战后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进行研究。“1945年以来的规划理论成为现代规划理论的主体”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战后重建”成为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过程中若干“核心思想词”之一^[15]。战后重建活动不仅促兴规划学科,也引起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思考。1946年苏联以国家层面制定的历史城市保护制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学习苏联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的内容之一^[16]。

2.2 “重建”促进规划教育的改革

二战后,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建活动席卷全球,规划理论的研究与建设人才的需求,促进了科研和教育的发展。在世界规划教育史上,以“物质设计”为主的战后重建,可满足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空间需求^[17]。英国政府在战后(1945—

1951年)颁布包括《城乡规划法》(1947年)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反映城镇规划在战后政策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决定规划教育的改革。二战后欧美规划教育发展成熟,并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规划大师和专业学者。规划学科自身发展促进“规划实践”与“规划教育”互动,这种特征在战后重建中表现更为突显。

2.3 大部分“苏联经验”源于战后重建

苏联城市的战后重建走出不同于欧美的道路,并影响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因国际环境的改变,包括战后重建在内的“苏联经验”对新中国城市规划产生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苏联规划的诸多译著,大多数成稿于二战后的重建时期。这些文献是新中国成立后规划实践主要参考的资料,被规划前辈们称之为“天书”。如林徽因、梁思成译著的《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③于1952年出版,原著于1947年由俄罗斯联邦公用事业部出版社出版。苏B.L.大维多维奇所著的《城市规划:工程经济基础》,原著于1947年出版,中文版于1953年出版。苏联马尔捷夫等所著《苏联公共卫生学》,原版为1951年出版,中文版于1953年出版……。1950年的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方案的交锋,实际上是欧美城市更新的规划理念与苏联城市改造、重建思想的博弈和对决^[13]。随着计划经济制度的引进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专有词汇“城市规划”逐渐替代“都市计划”,进而开启新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之路,其背后隐藏着因战后重建而引发的欧美与苏联两种规划思想的博弈。

3 战后都市计划制度与实践

抗战胜利后,城市重建工作成为这个时期的首要任务。从学科史研究的视角,有研究近代“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度研究^[18]、民国时期都市计划知识体系^[5]、抗战胜利后南京的规划方案^[19]、北京梁陈方案之前的规划方案^[20],以及大上海都市计划三稿编制等方面,反映战后规划相关的制度与实践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归入近代规划学科发展的部分^[12]。在世界规划领域发展的视阈中,中国本土的规划实践与制度创造是世界相关领域发展的一部分。战后部分重点城市启动了规划相关的工作,包括制度政策、规划实践等都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后世颇具影响。规划学科发展得益于规划实践、制度政策和理论研究合力作用的结果。学科教育则是实现学科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3.1 逐步完善的都市计划制度

抗战胜利后许多百废待兴的城市,需要“都市计划”在城市建设和提高居住环境方面予以实现。在都市计划制度方面,不仅制定《都市计划法》,而且建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度。实际上,“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度早在战前就开始酝酿,战后则迅速成立。“当战后残破之余,一切要政莫急于修复、莫重于建设,而修复与建设自当以中央先后颁布之都市计划法及收复区域城镇营建规则为依据”^④。其原因与战后所面临的城市问题直接相关,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当时国内的重点城市。当时成立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和工务局,他们的职能各有偏

重，前者是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后者则偏重于工程设施的实施。1946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颁布《都市计划委员会组织通则》，要求各市组织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同年8月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度的推广促使其他相关都市计划法规的发展，为战后重建规划实践提供必要的制度条件。

3.2 战后重建的都市计划实践

3.2.1 战后重建的基本条件

抗战胜利后的战后重建工作，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野点，此前属于近代史的战后重建时期，此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战后重建的现代史部分。当时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球史意义上仍为战后重建时期^[21]。抗战胜利后，我国在吸收国际规划经验与本土实践探索中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形成高等教育体系，有一批成熟的专业精英和都市计划的制度体系。战后重建活动就在上述基础上进行。

早在1942年，朱皆平在其《近代城市规划原理及其对于我国城市复兴之应用》提出复兴城市的若干任务^⑤，即“（一）建立新城市，（二）改造旧城市，（三）疏散大城市，（四）恢复抗战损毁之城市”。战后在全球范围内“旧城重建”与“新城建设”成为这个时期规划实践的两大主题，许多规划理念更加平民化、现实化。不论《大武汉区域规划》，还是《大上海都市计划》，都围绕着“重建”与“新城建设”开展规划实践，体现了国际规划理念对我国的深刻影响。参与规划实践的人员，通过留学或管理经历，了解了卫星市镇、有机疏散、邻里单位等规划思想，这为战后重建提供了规划理论准备。

3.2.2 战后重点大城市的规划实践

1945—1949年，上海、南京、北平（北京在1928—1949年的称谓）、广州、武汉等重要的大城市率先进行新一轮规划，这些规划项目成为世界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范例。在战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完成或基本完成城市规划的县城以上城市有90余座^[12]。从其中的重要城市总体规划及其评述看，每一项规划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学科发展意义。尽管在战后仍有少数外籍人士参与这些城市的规划编制，但总体而言已逐渐实现

本土技术人才自主编制都市计划。这点与同一时期的规划教育具有共同的特征，已形成规划学科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1946—1949年间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一、二、三稿，完成于中国城市规划从近代迈入现代的门槛之上，是中国第一次在现代规划理论指导下的较为完整的规划实践^[22]。陈占祥等在南京明故宫周边地区进行的《首都政治区建设计划大纲》，对后来的梁陈方案奠定了实践基础。1945年8月后，“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成立，11月24日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12月出版《武汉区域规划实施纲要》，旨在实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与城市建设之崇高理想^[23]。1946年12月长沙市政府拟定《长沙市建设计划草案》，1947年2月当局重新制定《长沙市建设计划修正草案》，1947年9月《湖南省建设计划大纲》对长沙的建设作出具体规定，其目的是使长沙重建为模范市区，且具近代城市所必须具备的物质建设^[24]。见表1。

该时期上海、重庆等地规划则采用战后西方国家的卫星城镇理论。逐步完善的大武汉规划成为近代中国首部区域规划成果。这一时期的规划实践为后续的规划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印证了我国近代的城市规划学科已具备国际规划理论的支撑体系。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都市计划难逃最终流产的境地，然而其规模宏大的战后重建活动和对规划建设人才的需求已成为促进规划教育领域相应发展的内在动力。

4 战后重建中的规划教育重构

4.1 高等教育复员、重建的基本政策

抗战胜利后的教育复员工作（1945—1947年）是国家战后重建的一部分，使全国教育资源在地域上分布更趋合理，这是一次近代以来规模宏大的教育调整运动^[25]。我国高等院校经历了复员与重（新）建的过程。抗战前或抗战中的教学资源分布格局，大部分已被重新调整。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是一次教育资源的重大调整的话，那么抗战胜利后的“教育复员”与“新建运动”并不亚于它。1947年1月1日颁布《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通过），其中包括了教育基本政策。“战后重建，需才孔亟，高等教育则是高等人才输出之地，政府重视在所必

表1 战后重点大城市的规划实践项目统计表（部分）

Tab.1 Statistics of planning projects in major cities in the post-war period (partial)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编制时间
1	上海	《大上海都市计划》(一、二、三稿)	1946—1949年
2	南京	《首都政治区建设计划大纲》	1946—1948年
3	重庆	《大重庆市战后建设计划纲要草案》《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	1945—1947年
4	北平	《北平新市界草案》《北平新都市第一期计划大纲》	1946、1947年
5	广州	《广州市土地分区使用办法(再修正案)》《广州市土地重划计划书》	1947年
6	武汉	《大武汉建设规划之轮廓》《武汉区域规划实施纲要》《武汉区域规划初步研究报告》 《武汉三镇土地使用与交通系统计划纲要》	1945年、1946年、1947年
7	长沙	《长沙市建设计划草案》《长沙市建设计划修正草案》	1946年、1947年
8	南昌	《南昌市五年建设计划草案》《南昌新市区规划案》	1946年
9	桂林	《大桂林三民主义试验市计划》《桂林市新市政建设计划》《桂林市复兴营建计划说明书》	1945年、1946年

然”^⑥。当时以“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⑦的口号，开启了全国性的教育复员工作。抗战期间西迁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分别迁回江南的宁沪地区与华北的平津地区，其中包括在李庄的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此次高校教育复员结束后，1948年1月1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1945年9月20至25日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不仅奠定了战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的指针，也影响到1945—1949年间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整个教育发展的布局^[25]。其中，高校回迁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专科以上学校及研究机关复员案》是由当时教育部提交的第一号提案。到1947年4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数量达到193所，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1万多人。与抗战以前相比，专科以上学校数量增加了80%，学生人数增加了3倍以上^⑧。除了国立专科学校，部分私立专科学校保留在原沦陷区，复员中受到相关的政治审查程序，如教会学校。

4.2 建筑院校的教育复员与学派特征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各个综合高校和专科学校，以专业教育资源集中强化为目的进行整合与重组。抗战胜利后的教育复员和重建过程使积累近半个世纪的教育资源在部分高校被保存下来。许多院校保留着都市计划或市政工程学科，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和规划专业的建立。有以建筑类为基础的院校，还有与规划、土木类型相关的院校，这些院校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规划建设领域培养了许多专业建设者、管理者和学者。

近代以来，我国建筑院校具有相对固定的设计流派特征，主要是由建校和建立学科的师资来源决定的。如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体现的是美国现代主义学派，同济大学体现的是德国包豪斯现代主义学派，本土建立的中央大学建筑设计体现的是综合学院式的特点。此外，还有重庆大学的建筑系因抗战时教学交流而建立的建筑院校。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城市重建以及迁建区乡村建设活动急需建筑专业人才，使都市计划与建筑设计方向的人才培养在复员后的建筑院校中得以延续和强化。

4.3 教学体系的继承与规划课程的设置

抗战胜利后的规划学科教学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与教材以及毕业生的设计作品上。其总体特征是一个从仿效西方手法到自主设计创新的过程，同样体现在战后重建与新城建设两大主题。许多建筑院校设置了实习实践课程，学生有机会参与实际的都市计划项目。

4.3.1 继承战前的教学体系

我国近代建筑教学体系在战前已形成学院式和现代式两种趋势，两者的区别是前者重艺术，后者重技术。前者受官方认可，属于“正统”的教学体系，以中央大学、东北大学为主，后者以偏居南方的广东勸勤大学最为活跃^[26]。偏重于艺术性的学院式主导着大部分院校的课程设置，包括都市计划课程，并延续到战后重建时期。这一建筑教学传统基本上源自体现法国布扎建筑教育体系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虽然勸勤大学

的新技术学派在当时并不是主流，但在战后该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仍然是国家所需要的。

4.3.2 战后的课程设置与教材

抗战胜利后，与抗战前采用外文教材并外语教学的情况不同，各地高校着手研编适合本专业的教材，这一点体现出建筑领域的教学已全面从仿效转向自主的发展^[27]。早在抗战前国立中山大学陈训烜编写的《都市计划学》是近代以来大学的唯一自编规划教材^[9]。因抗战爆发，各地城市被毁严重，出于对城市重建的考虑，都市计划课程于1939年列入教育部《大学科目表》。

在战时和战后一段时期，都市计划课程已在建筑工程和建筑学专业的高年级作为必修课程设置，同时在市政管理、经济等院系也开设都市计划相关的课程。如1943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开设了“都市计划”课程，1945年北京大学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五分班建筑系四年级开设都市计划和建筑规划，1947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设市镇计划，1949年之江大学建筑系开设城乡规划论和城乡设计课程^[12]。此外，1946年同济大学土木系开设都市设计课程，并设置市政组定向培养专项人才。

4.4 教职人员的构成及其背景

战后重建过程中规划建设人才是稀缺的，不论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者，还是高校的教职人员。这个历史时期规划学科的教师，大多数是以建筑和土木工程为学科背景的技术精英。他们在1920—1930年代接受了五四运动之后近代化的高等教育，在二战前（或期间）又接受了欧美国家的规划专业教育。

在世界各国的战后重建中，留学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者选择归国建设以实现自身价值。学术精英参与到高校都市计划学科的教育工作当中，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尤为明显。他们兼顾规划实践和规划管理，同时在建筑院校担任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这里选取近现代规划学科的重要人物梁思成、金经昌、哈雄文、冯纪忠、陈占祥、鲍立克（Richard Paulick）为例（见图1），观察他们在战后期间的发展轨迹，充分说明了这个时期规划教职人员的基本特点。建筑设计和规划设计属实践性学科，在战时和战后时期出现一些专业人士兼工程业务与教学，或兼职政务与教学的情况比较普遍。

抗战胜利后的都市计划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国内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参与规划教育活动的学者构成看，留学归国的技术精英兼职管理、教学，将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国家战后重建的规划实践和重建过程中的规划教育融为一体，他们本身的学术水平得到升华，使我国规划学科教育始终处在世界前沿并具有本国实践的特色。

5 抗战胜利后规划教育发展的特征与影响

5.1 学科本土化的过渡与历史转向

“抗战胜利后（1949—1952年）”的城市规划教育发展阶段，处在国际上的战后重建时期。对于建筑与规划领域的教育来讲，虽然受到不同来源的影响，但仍呈现在“移植、融合与转化^[28]”中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段民族国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行，同步于国际重建家园的过程。这个时期是城市



图1 抗战胜利后著名规划学者的专业发展示意图

Fig.1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well-known planning scholars after the war victory

规划范式转型的过渡阶段，从开始强化欧美现代主义转向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规划模式，即固化了欧美学派现代主义的规划理念与方法，积攒本土实践的学科成果。不久后受苏联影响的新中国城市规划教育，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继续完成抗战胜利以来的本土化发展过程。可以说，规划教育领域是保持本土与欧美学派的种子，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到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这段时期的学者成功地实现这一影响。这一时期是我国近代规划教育发展的成熟阶段。

5.2 规划实践与规划教育的互动性

近代以来，大学教授因其自身代表着城市的中产阶级，是传统绅士阶层的后继者，所以，作为近代萌生的教学机构——高校及其教授们与社会、国家的发展无法割裂^[29]。归国的技术精英，身兼社会实践和高校教学双重职责，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社会的发展，因此对都市计划的管理和高校的人才培养都抱有饱满的热情。

抗战胜利后，虽然延续战前的学科课程设置，但其学科设置的质量与深度不同于以往。原因在于，毕竟战后重建亟须城市建设人才，规划教育的重要性得到充分的认识。留学海外的归国学者致力于重建兴国的伟大事业之中。以战后重建和规划人才的需求为基础，归国学者投身到国家战后重建的各个岗位，包括政府部门和综合院校任职。正因为他们的参与，使当时先进的国际规划理念和知识体系融入教育体系 and 实践项目当中，其教学成果与实践因而具有现代主义与理性主义流派的特征。舶来的规划知识体系逐渐被融入中国的实践，通过实践的验证又将其核心知识与中国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形成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本土化理论基础^[3]。这种规划实践与教育的互动性——“真刀真枪”做规划，成为规划院校学科建设的法宝。

5.3 为新中国培养专业人才并奠定教育基础

抗战胜利后，由于开设都市计划学科的院校呈现多样化特征，不仅汇集不同源头的规划理论，还体现在国立、私立的高校及综合性、专科院校的课程设置。复员重建的高校对规划课程的设置逐渐清晰，如中央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在建筑工程类高年級的市政工程方向和建筑学设置的市镇计划课程。这些高校培养出来的学术、管理人才，迅速走上了包括专业教育和实践、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岗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领域中的中坚力量。抗战胜利后，这些高校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规划建设和城市规划系统架构提供专业人才。

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期间，规划教育领域一方面延续着这个时期的教学计划，一方面受到政治环境的改变，逐渐接受苏联模式的教育体系。1952年以后的规划教育，整体上延续抗战胜利后的发展特征。因为这一代技术精英在解放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原本的规划实践与管理岗位兼顾难以为继，故而在1952年后逐渐选择专职在高校教学，继续发挥其人生价值和专业热度。因此，抗战胜利后这一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的院系调整重组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资源基础。

6 结语

抗战胜利后，许多学者为国家重建和规划教育付出了巨大努力。直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年，这些生逢鼎革的学者们思考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命运，在“去”与“留”中抉择。如陈占祥先生所说，“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给梁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情况，并表示愿同梁先生一起从事首都城市规划工作……”^[30]从此他与梁思成先生拉开

了新中国首都规划的帷幕。很多专家学者也如同他们一样，投入新中国的城市建设当中。

回首抗战胜利后的历史时期，建筑院校的复员过程，保持抗战前我国本土的教育资源；学成归国的精英源源不断地加入重建、新建的规划实践与高校教学中，使该时期规划实践与教学具有国际化且富有理想主义特征；该时期萌生的城市规划专业教育思想，直至1952年同济大学成立国内首个城市规划专业，使其专业教育思想得以实现^①。

战后重建规划的实践与欧美规划理论的发展两方面因素，客观上促进了这个时期我国的规划教育快速发展，促进规划专业教育的思想形成。建立一个培养城市规划学科人才的专业，成为战后重建时期城市建设最为紧迫的任务。虽然城市规划学科产生于欧美国家，然而中国一直以来是世界各国规划理论重要的实践地之一。我国的规划教育实现了将这些理论传承、消化和本土化的全过程。规划教育史是规划学科发展史必不可少的部分，它使城市规划事业根脉绵长、持续衍传。我国规划教育的百年是“学术上的开拓”“动荡中的坚守”的百年，也是继往开来的百年^②，这一过程让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在全球共知的规划语境中表达中国“声音”。

谨以此文献给经历百年风雨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向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事业的缔造者们致敬！

注释

- ① 因“都市计划”为在1952年之前的城市规划主流称谓，因此本文在探讨抗战胜利后中国的规划教育和实践、管理时采用“都市计划”一词。参见：李浩. 中国规划机构70年演变兼论国家空间规划体系[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 ② 参见：张万丽.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教育史研究[D]. 东南大学，2017：10-11。“我国近代城市规划教育的具体分期为孕育期（1923年前）、开端期（1923—1937年）、发展形成期（1937—1952年）”。
- ③ 摘自：王军. 城记[M]. 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3(10)：81。“林徽因、梁思成.《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龙门联合书局，1952年5月出版。原著英文版于1944年出版，苏联建筑学者罗宁宁所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在伦敦出版。”
- ④ 当时上海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在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会上的报告，转自：熊鲁霞. 走近编制“1946年大上海都市计划”的中国规划先辈(上)[J]. 上海城市规划，2012(3)：145-147。
- ⑤ 摘自：李朝. 中国近代市建制变迁下的城市规划实践演进研究(1921—1949)[D]. 东南大学，2021。
- ⑥ 摘自：施扣柱. 战后上海教育的重建(1945—1949)[J]. 史林，2016(3)：142-152。
- ⑦ 转自：贺金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1。“蒋介石：《建国时期，教育第一》，《教育公报》第17卷第9期（1945年9月30日）第2页”。
- ⑧ 贺金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60。“杜佐周：《战后中国的大学教育》，《教育杂志》第32卷第1期（1947年7月1日），第32-33页。”
- ⑨ 摘自：王军. 城记[M]. 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3。

参考文献

- [1] 张万丽.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教育史研究[D]. 东南大学，2017。
- [2] 吴志强，周俭，彭震伟，等. 同济百年规划教育的探索与创新[J]. 城市规划学刊，2022(4)：21-27。
- [3] 吴志强，杨婷. 同济规划设计教育的早期发展[J]. 城市规划学刊，2019(3)：11-19。
- [4] 杨婷.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育思想发展史研究[D]. 同济大学，2018。
- [5] 李季，李百浩. 近代自编教材《都市计划学》的规划知识体系[J]. 城市规划，2020，44(11)：58-68。
- [6] 吴良镛. 七十年城市规划的回顾与展望[J]. 城市规划，2019，43(9)：9-10。
- [7] 董鉴泓. 同济生活七十年[J]. 城市规划学刊，2015(4)：127-128。
- [8] 王伯伟. 建筑弦柱：冯纪忠论稿[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 [9] 李浩. 城市规划口述历史方法初探(上)[J]. 北京规划建设，2017。
- [10] 李文墨. 苏联模式影响下我国规划专业教育的“本土化”发展(1952—1961年)[J]. 城市规划学刊，2020(1)：111-118。
- [11] 李志毓. 1945—1949年的中国政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相关研究综述[J]. 兰州学刊，2016(1)：95-114。
- [12]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中国城乡规划学学科史[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 [13] 许皓，李百浩. 从欧美到苏联的范式转换：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源头的考察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2019(5)：1-8。
- [14] 尼格尔·泰勒.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M]. 李白玉，陈贞，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 [15] 吴志强. 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导论[J]. 城市规划汇刊，2000(2)：63-69。
- [16] 张松，李文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苏联影响”[J]. 城市规划学刊，2019(5)：85-91。
- [17] 谭文勇，冯雨飞. 百年英美城市规划教育演变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2018，33(4)：117-123。
- [18] 吴东. 近代“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度研究[D]. 东南大学，2018。
- [19] 李浩. 抗战胜利后南京规划的历史考察(1946—1948)[J]. 城市发展研究，2021，28(7)：124-132。
- [20] 李浩. “梁陈方案”原点考论：以1949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为中心[J]. 建筑师，2022，218(4)：85-94。
- [21] 华揽洪. 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M]. 北京：三联书店，2019。
- [22] 侯丽，王宜兵. 《大上海都市计划1946—1949》：近代中国大都市的现代化愿景与规划实践[J]. 城市规划，2015，39(10)：16-23。
- [23] 郭常顺.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受与重建(1945—1949)[D]. 华中师范大学，2018。
- [24] 钟思游. 抗战胜利后长沙市政建设与管理研究(1945—1949)[D]. 湖南师范大学，2018。
- [25] 贺金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26] 谢璇. 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D]. 华南理工大学，2011。
- [27] 侯丽，赵民. 中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回溯与思考[J]. 城市规划，2013(10)：60-70。
- [28] 钱锋，沈君承. “移植、融合与转化”西方影响下中国早期建筑教育体系的创立[J]. 时代建筑，2016(4)：154-158。
- [29] 江文君. 专家的诞生：近代上海的大学教授[J]. 史林，2014(6)：21-28。

修回：2023-09